深化改革下的「兩會」新風尚

黃英豪 全國政協委員

成由儉來敗因奢，這是古今中外顛撲不破的眞理。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還是屬於落後水平，建成小康社會還需要進一步努力和深化改革。面對新的形勢，我認為這將又是國家發展和政協工作的一個新的起點。同時，對港區政協委員來說，也是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戰。政協已經成為協商民主制度下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更需要全面加強對國家發展現狀的了解，圍繞國家建設的大局，充分發揮香港委員的優勢，結合內地的實際情況，更加積極地獻計獻策和貢獻力量。

■黃英豪

京華三月，春意盎然。回顧剛剛成功舉行的「兩會」，深感在國家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大環境下，呈現出許多令人鼓舞的新風尚，我認為最大的特點之一，是會風既隆重熱烈，又務實簡樸，實效明顯，充分體現出新一屆領導人改革創新、銳意進取、實事求是、杜絕奢靡的精神。

會風體現中央杜絕奢靡

以政協方面為例，為期十天的會議重點突出，效果顯著；日程精心安排，連貫緊湊；會議紀律嚴明，氣氛活躍。開會之初，有關負責人就強調了國家非常重視政協的地位和作用，並將政協的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作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協商式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協商已經成為國家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同時，也要求委員們一心一意地開好兩會，無論是大會、小會都要積極投入、全程參與，非必要就不宜請假缺席。據說還有不成文的規定：如果無故缺席三次大會，就有可能被取消委員資格。這樣嚴格的要求，是歷次大會少見的。

政協更為強調要充分發揮委員們參政議政的主體作用，委員們也積極響應，例如港區委員的會議出席率都較高，過去很少出席小組會議的委員，這次也基本全程出席。在討論會上，委員們發言更是非常踴躍，大家都有欲罷不能的感覺。從總體上看，會議期間提交的全部提案有5800多份，數量和質量均高於上年。我自2003年參加全國政協的工作，記得當時會上提交的提案只有3000多份，如今提案數量增加了近一倍，焦點都是集中在民眾最為關心的大事上面，如17%關注深化改革，25%關注民生，10%關注環保。此外，委員們還提出了近千份很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都得到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

北京「官場」風氣煥然一新，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協就在確保服務質量不減的前提下，簡化了接待工作流程，減少參會工作人員，委員用餐嚴格按照標準提供(據悉是每人150元/天，早餐30元，午晚餐60元，這在酒店用餐來說是偏低的)，貴價食品基本看不到了。過去每逢「兩會」，也是許多部門和省市「聯誼、招商」的大好時機，會外的洽談、宴請非常之多，「趕場風」相當熾熱，經常是一晚要趕上三、四場，每場更必有佳餚美酒招待，盛情之下，委員們不得不「白天開會，晚上喝酒，疲於奔命」，許多地方還有送禮之風，經常有食品、文具、公文包等精美禮物送過來，不收又怕得罪人。

北京「官場」風氣煥然一新

而今年奢靡之風均被杜絕，再也沒有什麼人送禮物，宴請也是少見。當然，據了解，涉外部門正常工作交流和必要的聯誼活動可以繼續進行，只是主要在辦公室裡進行，往往是清茶一杯，講求實效，到了用餐時間，大家就到單位餐廳去用餐。例如，我到最高人民法院與領導交流，之後就一起到了辦公樓的餐廳吃午飯。去北京會議中心的委員駐地開會，團中央及全國青聯多位負責人都是去大廳，和大家一起吃飯。過去盛行的動輒茅台、五糧液的「酒文化」也改變了，最多就是上點「二鍋頭」這樣大眾化的酒。會議期間和一些領導和大型國企的負責人交談，得知現在「三公」消費大幅度減少並管得很嚴，一位國企老總說，以前他經常出國，有時還坐商務包機，但現在嚴格規定如有公務去美國，加上來回時間只能有五天，而且審批很嚴。據說，不少來京開會的外地官員，還專門去了慶豐包子店，嘗試20元一份的「主席套餐」，用他們的話來說，這也是與基層廣泛接觸，「接地氣」的體現。

對於現在的良好風尚，委員們都感觸良多並期待能夠制度化和持久化。成由儉來敗因奢，這是古今中外顛撲不破的真理。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還是屬於落後水平，建成小康社會還需要進一步努力和深化改革。面對新的形勢，我認為這將又是國家發展和政協工作的一個新的起點，同時，對港區政協委員來說，也是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戰。政協已經成為協商民主制度下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更需要全面加強對國家發展現狀的了解，圍繞國家建設的大局，充分發揮香港委員的優勢，結合內地的實際情況，更加積極地獻計獻策和貢獻力量。

「真普聯」立會方案節外生枝

卓偉

「真普聯」昨日提出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案，建議維持七十個議席，其中一半以單議席單票制選出，另一半議席就由全港不分區比例代表制選出，並廢除所有功能界別議席，包括超級區議會議席。「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明白要在下屆立法會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並不容易，因此提出過渡安排云云。在社會各界就2017年特首選舉爭論激烈，各方意見相持不下之時，「真普聯」突然拋出立法會選舉方案，完全是節外生枝，令社會各界更難就政改方案達成共識。「真普聯」繞開特首普選，大談立法會普選的問題，是本末倒置之談。為了集中處理行政長官普選問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不宜做大幅度的修改，一些人堅持在立法會選舉上借題發揮，究竟是為了促成政改，還是妨礙政改呢？

事有輕重緩急，先後次序，現在對香港政制頭等大事是2017年的特首普選，特區政府正就政改方案進行諮詢，中央也釋出善意邀請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到上海交流，與中央官員直接交流意見。單就特首普選的議題已經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要凝聚社會共識已經不容易，試問何來時間討論2016年的立法會方案？況且，立法會選舉在上屆才剛經歷重大改革，不但增加了10個議席，更破天荒創立了「超級區議員」議席，大幅增加了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分，市民才開始熟悉有關選舉，現在斷沒有理由再度大幅修改，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選舉，每一屆都大幅改變，每一屆都推倒上屆的模式？這叫市民如何適從？

更重要的是，「真普聯」提出廢除所有功能界別議席，既違反《基本法》均衡參與的原則，也不可能得到立法會多數議員和商界與各功能界別的支持，在社會上也是爭議性極大。功能組別體現均衡參與，這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制發展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怎可能輕率改變？「真普聯」提出的方案不過是白費氣力。社會須提防的是，一些激進反對派議員突然拋出更具爭議性的立法會選舉方案，並非是為促成政改，而是為政改製造更多的人為障礙，對於依法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並沒有任何好處。

人大代表要敢於發聲善於發聲

姚榮銓 姚姚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本月6日參加人大香港代表團審議，就香港政改問題定調，讓700萬港人清楚了解中央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的「三個原則」以及「一個立場三個符合」。

張委員長鏗鏘有力帶頭發聲，就是要帶動港區人大代表們「敢於發聲、善於發聲」，主動配合特區政府做好當前的政改諮詢工作，善於耐心向港人解釋中央的原則立場，敢於批駁違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破壞法治的歪理邪說，積極引導社會輿論，幫助廣大市民做出正確判斷，一言以蔽之：「人心回歸是根本」！

未過三朝，筆者就接到了正在北京開人代會的港區人大代表團領導之一馬逢國先生發來的電郵，他將以其「馬逢國立法會議員辦事處」的名義邀集業界，定於下月七日下午在灣仔活動中心舉行《文化界政制發展諮詢會》，而且已經請好了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三位嘉賓來互動……港區人大代表如此立馬回應，實在令人鼓舞。筆者期望一馬當先不只是馬逢國一位，而是港區的人大代表們啊！

人大開幕翌日，筆者為本報撰寫了《發揮港澳政協雙重積極作用》評論，講的是港澳政協委員不只為「一國」積極建言獻策，而且要為「兩制」積極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俞正聲主席所提出的「雙重積極作用」制度化，對於壯大愛國愛港愛澳陣營具有的正能量是不言而喻！如今，港澳人大代表和港澳政協委員肩並肩地一致回應中央，敢於發聲、善於發聲，努力去實現「人心回歸」的艱巨任務，就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來說，不但有着迫切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貢獻。

駁斥歪理邪說 重視「社團」發聲

筆者注意到，張德江委員長在宣導積極、敢於、善於「發聲」時，不是泛泛而談，而是有的放矢，以「發聲」這支利箭去射「當下香港的輿論環境」這個靶子！筆者也關注到上月26日香港《文匯報》頭版頭條的「本報啟事」，其中提到「還將改革社團版，更好地服務各界社團」。過去認為澳門人口少社團多，近日才從李曉惠先生新著《邁向普選之路》中獲知：澳門特區社團密度再密，10000人之中也只有64個，而香港特區則達到304個之多，為世界之最（美國是5.18個、法國是11.05個、日本是9.72個）。還須說的是本港回歸前註冊或視作註冊的社團總數只有8695個，到2010年已突破23,000個，無論政府官員、商家老闆，還是專家學者、平民百姓，人人生活好像都離不開社團，香港社會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社團社會」！因此，對於社團「發聲」不可等閒視之。

希望其他本港媒體也如《文匯報》一樣從香港特區這個特別區情出發，重視社團的「發聲」。改變當下本港輿論環境，新老媒體及輿論界人士責無旁貸！不論是港人還是國人，都有權利和責任來嚴正提問：為什麼似是而非的觀點可以滿天飛？為什麼吆喝假民主的販子能自由自在「佔領」版面、熒屏、線上？為什麼小貓三隻四隻的非主流社團反而吃香「優先」？

普選方案須堅守兩個前提

梁偉浩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的普選方案討論必須堅守兩大前提：一，香港所有與政改有關的事宜，都必須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內進行。二，香港無論以何種方式普選出來的特首，都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為此，本人明確反對時下反對派所提出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混合提名、雙軌制、三軌制，以及在提名委員會前加入前置程序等觀點和方案，因為這些做法和提法，無論如何包裝和辯解，都是企圖繞開、架空和代替提名委員會，都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進而挑戰中央對港憲制地位。

■梁偉浩

普選特首是中央賦予港人的權利

在香港落實普選，是中央的莊嚴承諾。真正賦予港人普選權利以及明確香港普選之路的，是《基本法》。回歸以來，中央採取務實舉措，穩步推進香港民主發展。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有關解釋，明確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法律程序，香港民主循序漸進向前發展邁向普選的法律路徑更加明晰。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明確了香港普選的時間表，顯示出中央對在香港特區落實普選的誠意。

但正如所有比賽都有賽例一樣，本港落實普選也不可能沒有規矩和底線，這個規矩就是《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和人大決定。去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峇里會見特首梁振英時，明確表示香港所有與政改有關的事宜，都必須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香港是法治社會，特區政府和全社會都應該依法辦事。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明確要求。

普選大直路上有人不惜翻車

目前，本港社會對政改的分歧，歸根結底是要不要依法討論普選的問題。反對派企圖令普選「走彎路」，主要體現在企圖以「公民提名」架空和代替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反對派卻堅持要搞所謂「公民提名」，顯然是不依法辦事。 這些人刻意在普選的「大直路」上，仍然堅持提出違反《基本法》的方案，否則寧願一拍兩散，這就等於在終點在望時，還要違規切線，甚至逆向而行，結果只能是撞車收場，本港的普選也依然遙不可及。

在民主發展史上，在普選模式上，並不存在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準。1994年的聯合國《人權與選舉：選舉的法律、技術和人權手冊》指出：「聯合國有關選舉的人權標準性質甚為廣泛，因此可透過多種政治制度而達至。聯合國在選舉方面提供協助，並非旨在將任何一種已有的政治模式強加於任何地方。相反，這是基於我們認同沒有一套政治制度或選舉辦法適合所有人和所有國家。」這說明，即使是西方的普選制度，也不是千篇一律，不存在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統一答案，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的「真普選」。

而反對派提出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混合提名、雙軌制、三軌制等，以及提出的要在提名委員會前加入前置程序等等，都是企圖繞開、架空和代替提名委員會，都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當年由中央以及港人經長時間反覆討論才確立的由具有廣泛代表性、四大界別等比例均衡參與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這一制度，是防止搞民粹主義政治的人當特首的一道安全閥；是為了有利於推出一個能代表香港整體利益、平衡多元需求、防止過度照顧某一界別利益的特首候選人。此外，提名委員會的設立，更是為了保證能夠得到中央認可的愛國愛港人士，可以代表國家執掌香港最高權力。

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出，《基本法》的精神已經強調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的人士出任，並形容這是「不言而喻」的原則。從法律角度來講，堅持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現行規定的要求。在法理上，特首是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樞紐，《基本法》第43條規定，特首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負責，而48條規定特首負責執行《基本法》。因此，如果對行政長官沒有必須愛國愛港這一條要求，「一國兩制」安排就行不通，《基本法》的許多規定就無法落實，香港繁榮穩定就沒有保障。因此，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設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而正因為這一底線是如此關鍵，才恰恰成為反對派集中火力，一定要攻陷或者架空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原因。

香港乃多元社會，有不同聲音很正常，何況政改諮詢才剛開展，提委會和現有選舉委員會的成分可以有不同，各界別比例並非一成不變，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名程序、候選人數目、普選安排等事宜都還有時間進行充分的探討。但本人認為香港普選方案必須堅守上述的兩大前提。事實上守住這兩大前提，不只關乎國家安全和統一，也正正是為了維護香港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投資者的根本利益。

從天災到人禍 日本核去核從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東張西望

日本九級強烈地震並引發海嘯，這場天災已過去三周年，但在這一千一百天內，日本政府不但在善後福島核洩漏污染方面難如人意，反而在「擁核武」方面也傳出許多雜音，甚至是叫囂。不但惹起日本國內堅持反核人士的強烈不滿，亦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甚至日本的盟國美國也發出擔憂的聲音。

當下，日本國內對於是否重啟核電站仍爭論不休。一方面是對三年前滿目瘡痍景象仍歷歷在目的主流民眾，堅決要求無核生活，他們無法再次承受核災害造成的巨大破壞力。三年過去，仍有13萬人被疏散他鄉，有家難回。而另一方面，安倍表示，對於零核日本沒有信心。安倍政府召開相關閣僚會議，確定了新《能源基本計劃》草案，決定將核電定位為「重要的基荷電源」，迫切要重啟處於封存狀態的48個商用核反應爐，甚至還會建設新的核反應爐。有分析指，之所以稱「基荷電源」而非「基礎電力」，也是有意用陌生詞彙，減低刺激反應。日本政府從棄核的菅直人，到模稜兩可的野田佳彥，再到重啟核電的安倍，恢復用核決心日益增強。因為內憂外患的安倍知道，資源緊缺的日本若一直靠進口國外的能源填補核電力缺口，會對國家經濟造成壓力，影響民眾生活品質，更重要的是直接影響製造業。潛心發展日本經濟的安倍，「用核」是解決經濟成本的根源，重啟核電從而降低電價，改善生產，促進出口，達至經濟良性循環，安倍政府才能有民望基礎實施別的計劃。

日本「擁核」惹國際社會關注

不過，除了經濟利益的考量因素，其右傾化路線，引致國際社會懷疑其背後是否暗藏「擁核武」的企圖。有批評指，安倍借民用核發展掩蓋其軍事用途，是安倍政府急於重啟核電的更重要原因。日本作為只有37萬平方公里的島國，卻被57個核電站包圍，而核電站反應堆中的燃料，經提煉可以產生製造核彈的鈽，且可以儲存，而民用的需求又非常低，不是軍備之用難以開脫。據美國專家估算，日本的核材料儲存量目前已超過美國，世界第一。日本右翼勢力也曾揚言，日本在183天就可以製造出核彈。美國同樣擔心日本擁核，因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受過核打擊的國家，且原子彈來自美國。現時安倍政府野心勃勃，急欲擺脫美國的控制擺佈。若不再看美國臉色，也難免不會報廣島之仇？

而國際社會除了關注日本「擁核」，對日本核洩露關注熱度始終有升無跌。福島核電站的放射性污水以及其他核污染的問題，尚未徹底解決。核污水不時排入太平洋，構成對生物鏈的致命性破壞。災難發生之初，東電公司人員有意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低放射性污水排入海中，以便騰出空間處理高放射性積水，且公司聲稱，2011年6月之後，沒有新的放射性污水排入海洋。直到去年8月日本政府才承認，福島第一核電站每天有至少300噸核污水流入海洋，且這種情況可能從核事故發生後一直存在。污水洩漏事件愈演愈烈，問題一日不徹底處理，地球都要為福島核災難埋單。

■福島核電站的放射性污水未能徹底解決，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日本企業乃至政府都為了短暫利益，不但掩蓋核污染情況，且居心叵測隱瞞武器級核材料儲存數量，規避責任。若再不正視問題，公開情況，日本重新啟核是累人累己。